

散文



随笔

初到贵境（下）

一个老归侨的记忆（之二）

玩具制造公司比较简单，它租用工业中心这座大厦的半层楼面，把它间隔成三部分：办公室、装配车间和仓库。没有加工厂，更没有大型的机器设备。它只是掌握玩具制造的两头：一头是设计，另一头是装配和出口。所有玩具的零配件都是外加工或购买，然后在装配车间里装配成最终产品，出口时在仓库里包装然后装运。和我在国内时所见的工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
我天天努力工作，早出晚归，画出一张张各种设计图纸。三个月的试用期满，刘经理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，通知我给我转正，并加一百元工资。欢欢喜喜地从刘经理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位置，见我的助手也喜形于色，就随口问他是否也已转正？三个月来，我和他既是同事又是师徒，他刚从大学毕业，搞设计尚缺乏经验，我处处给他指导，他感激称我“老师”。知道他也已转正，就漫不经心地问：

“你转正加了多少工资？”

“四百元”他回答说。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索性再

问：“你原来的工资是多少？”

“两千四百，现在转正后是两千八百。”

我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和不平，因为我进来的工资只有1300元，转正后只有1400元，堂堂一个机械工程师，只拿初出茅庐助手的一半工资！

立即找刘经理理论并表示我的不满，他平静地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公平的，你制图制得很好，我们聘你为机械工程师。但是，你是大陆大学毕业的，香港不承认大陆的文凭，我们是以高中毕业生的标准给你定工资。”

接着他又说：“你不信，可以到外面问问，在香港，高中毕业生的起始工资是不是一千三百元左右！”

我的自尊心受到好重的打击，然而，初到贵境，不得不低头。只能愤愤地说：

“实在欺人太甚！利用我的廉价劳动力，让机械工程师的工资只有助手的一半！”，并表示要辞职不干。

经理挽留我，却只字不提会调整我的工资。因为他知道我刚从大陆出来，不相信真的会辞职离去。



上世纪1980年香港，路面很整洁，绿化规划得井井有条。

其实只要能把我的工资调整到和助手一样，我就打算干下去。可惜经理没有这样做。

走出经理办公室，我即刻整理自己的东西，放进塑料袋，向他以及周围的同事打声招呼就离厂而去。虽然知道这一去要面临生活上的极大困难：我们一家三口租了一间七个平方米的房间，每月租金就要1100元，等于妻的全部工资，一旦我失业，衣、食、行和孩子的读书费都没有了着落。但是我不能忍受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卖我的劳动力。

在玩具厂三个月，最深刻的教训倒还不是工资低，而是体会到如果不会广东话和英语，真是“香港居，大不易”。

我曾带着设计图纸到别家厂商谈玩具另部件的外加工业务，不会英语至少要会说广东话才行。香港人对大陆既恐惧又厌恶，根本不愿学普通话，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香港人的根都在大陆，每一个香港家庭都在大陆有亲人，关系密切。但是，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，都把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当作斗争对象。

记得五十年代在印尼时，我们常看香港拍的国语片，香港片中的国语成为我们说国语的典范。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，香港已经不再放映国语片、没有人唱国语歌、香港人已经不会讲国语，也不愿讲国语了，电视里也听不到一句普通话。广东话在香港已成为官方

语言，也是学校里的教学用语言。这和我曾经待过的上海、厦门、广州不同，虽然人们在生活上都讲上海话、闽南话、广东话，但在学校的课堂上，一定是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。而在香港，令人惊奇的是即使用的是中文课本或是英文课本，教师都用广东话进行教学。入乡随俗，到了香港不学会广东话就会成为至少半个聋子和半个哑子。

在技术领域和商业领域，则突显出英语的重要。三个月在玩具厂，经常有一批批欧美采购商来参观和谈生意。他们和刘经理谈话前或谈话后，常跑到我的位子上看着我设计的图纸，询问我设计出来的玩具有些什么性能。不能直接用英语回答，只好请秘书小姐当翻译。从采购商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对于我不会说英语感到出乎意外，我则显得十分窘迫，甚至对这些洋人的到访感到不快。

非常悔恨在大陆高等学校里呆了二十多年，一门外语都没有真正学到手。心里老想著在香港生活如此紧迫的条件下，该如何赶紧学会广东话和英语？